

史

史

史

西寧城中文史資料

第十輯

中国少年儿童队在我省的
建立及其初期的活动
高原奇葩
拉脊山赋
湟滨往事偶拾
群彦会聚丁香园

PDG

城中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宁市城中区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8年6月

西宁城中文史资料(第十辑)

目 录 1998年6月

记中国少年儿童队在我省的建立及其初期的

主要活动	赵仰仑(1)
缅怀杨成琦同志	张维珊(7)
记老教育家徐景祥	侯万奎(10)
缅怀终生致力于西宁新学教育的王锡九先生	王学德(14)

高原奇葩——土族女诗人李宜晴	李逢春(18)
解放后河曲文化考古成果概述	陈希夷(27)
解放以来西宁地区春节习俗的演变	董绍萱(50)
戏迷杂话	许纳汉(60)
小园香径忆旧游	石葵(69)
西宁究竟有多少塔	张政成(74)
拉脊山赋	陈希夷(81)

解放后早期的一份劳务合同	杨文盛(87)
市场旧话两则	张志珪(89)
西宁能工巧匠录(再续)	张维珊(92)

湟滨往事偶拾	邓靖声(95)
旧事重提说家牌	严永章(123)
知识青年下乡琐记	罗耀南(125)

争鸣与纠错

纠正几点错误	邓靖声(133)
--------------	----------

文史通讯

群彦会聚丁香园	杨文盛(134)
编后有感	杨文盛(139)

记中国少年儿童队在我省的 建立及其初期的主要活动

赵仰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过了五天时间,10月6号至14号,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通过了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少年儿童队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领导下的少年儿童组织,吸收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参加。这个组织是在学习和各种集体活动中,团结和教育少年儿童,培养他们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物的新中国的优秀儿女。”这一史实说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是何等的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同年年底,北京和沈阳有两千三百名少年儿童首批入队。

我省少年儿童队的建立,是在1950年的下半年,这一组织从建立之日起,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学校教育中发挥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教育作用,今天这一组织,已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现就其建立经过及活动,回忆如下:

1950年9月,我从“民大”返回原校(省属的青师二附小、现西关街小学)工作,并在该校建立了团小组,直属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青海省工作委员会(简称为“团省工委”)。团省工委书记孙君一同志当时提出:要把少年儿童队的建立作为团在小学工作的重点任务,要尽快把少年儿童队建立起来。当时团省工委具体负责学校团队工作的是赵喜民同志和李光祖同志(后调省教师进修学院,已去世),他们都是西北民大来的同学,他们大约是四月份来到青海的,那时还都是二十刚出头的、积极热情、纯真无邪,工作不知疲劳的年青小伙。在他们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我们共同确定首先在青师二附小建立“中国

少年儿童队”，并且制定了建队计划：第一步是组织全校师生共同学习队的知识，如《少年儿童队章程草案》、队旗、队歌、队礼、队员誓词、申请入队的手续等。并且利用墙报、黑板报在校内展开宣传，以提高广大师生对少年儿童队的认识。同时积极准备少儿队队旗、红领巾、队长标帜，在此基础上采取积极慎重，分期分批的步骤，首先在高年级学生中发展第一批队员，建一个小队。

十月中旬，青师二附小举行了隆重的建队仪式。园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挂起了横幅，上面写着“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大会”，孩子们像过节日一样，全都穿上了新衣服。团省工委赵喜民同志、李光祖同志代表团省工委到会表示祝贺，并且宣布我为少儿队辅导员，由我宣布经学校团小组讨论通过的第一批少儿队员名单。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批发展的队员有辛修竹、陈耀德、窦文昭、罗生产、熊明邦等大约有十人。其中前四名现在都已评上中学高级教师职称，罗生产为了抗美援朝而参军，1991年他还从新疆来看我，我已认不出他了。当我亲手把第一条红领巾系到高原儿童胸前时，当他们举起右手，在队旗下宣誓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新队员的眼眶里充满了激动的泪花，我的心也在激烈的跳动，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紧接着市属各小学也都先后建立起少年儿童队组织，当这些带着鲜艳的红领巾的孩子第一次出现在西宁市的街头，他们相互见面，虽然互不认识，但又相互敬队礼、打招呼时，引起了市民们的极大兴趣，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新鲜话题。大家虽然搞不清“少儿队”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却都承认带红领巾的都是学校的好学生，红领巾是非常光荣的标志，孩子们也都纷纷要求加入队组织，为了能够带上红领巾，他们好好学习，遵守纪律，自觉为集体、为他人做好事，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学校的学习风气也大为改观，因此少年儿童队从一建立开始，就受到广大师生和家长的欢迎，就体现出这一组织无比优越的教育作用。

1951年我被调到女师一附小任校长，有名少儿队员，因天热把红领巾解下来放在课桌上，被同学不留神带到地上，小队长发现后批评这位队员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先烈的鲜血染红的，你弄脏了红领巾，就是沾污了红旗，你不配带红领巾”。她把红领巾拣起

来,交给当时正在实习的教师,实习老师随手放进抽屉。实习完毕离校时,忘记把此事向原班主任交待。可是这位队员,却因为失去红领巾,形成了极大的精神负担,她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红领巾,她自认为弄脏红领巾是犯了很大过失,除了对妈妈讲述了此事外,又不敢向老师讨还她心爱的红领巾,最后不思饮食,闷闷不乐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还含着眼泪对妈妈说:“妈妈,我爱红领巾”。当我知道此事时,已经无法挽回了,只能把另外一条崭新的红领巾献到她的遗像前,并且把这一则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而动人的故事,讲述给全校师生,把这位同学的红领巾布置在我们的队室里,教育我们的队员要热爱红领巾,教育我们的教师要懂得儿童的心态,要永远记住这一教训。

少儿队的组织建成后,能否经常开展适合少年儿童特点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丰富多采的队的活动,就成为这一组织能否长期吸引学生、长时期存在下去的关键。所以说队的活动,就是队的生命线。

建队初期,队的活动坚持以学习为主。即队的活动要有利于儿童的学习,但这绝不是让队员坐下来继续听教师讲课,而是采取多种儿童喜爱的活动形式,如参观、访问、游戏、表演、制作、展览、讲故事、搞实验、出墙报……,以加深巩固课堂知识,扩大儿童的知识面。它是课堂教学的引伸,不是重覆。同时我配合当时的“抗美援朝”运动,组织队员给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寄慰问袋,编排节目在街头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听志愿军战斗英雄作报告,与志愿军归国代表联欢;发动队员捐献飞机大炮……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的少儿队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队员罗生产,家住农村,比较贫寒,他利用星期天,上山割草,把卖草换来的钱,捐献出来,买飞机大炮,受到学校的表扬。队的活动还坚持以队员为主。“辅导员”顾名思义也只是从旁给予帮助和指导,不能包办代替,这样不仅培养了队员独立自主的工作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对集体的责任感。队的活动有其特殊的活动程序,如出队旗、唱队歌、呼号等,它不同于一般的课外活动,所以一开始,就非常吸引同学,建队初期,我们还没有鼓号队,1951年我从外地购置了一套鼓号,但队员们只会打鼓,不会吹号,因为我当时购置的是长管的青年号,老师不会吹,学生吹不响。直到1953年,我们才

训练出第一批鼓号队员，但那时还没队服。建队初期，由于队员在全校同学中的比例不大，所以每次队活动都要争取非队员同学参加，让他们“受教育”，其实把大量的少年儿童拒绝于队组织之外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无论是少儿队、还是少年先锋队，它都是少年儿童自己的群众性的教育组织。所以 1955 年 3 月，团中央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地、大量地发展少年先锋队组织的方针”，并要求“到 1956 年上半年，全国少年先锋队员发展到 250 万至 300 万”。7 月 9 日，教育部也向各地发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协助发展少年先锋队组织”的通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 124 页）这也是对建队初期存在问题的纠正。

建队初期，团的各级组织，也都非常重视队的活动，除平素加强对学校团队的领导之外，还利用寒暑假组织各种活动，让少年儿童渡过十分有意的假期，例如：

1950 年寒假，少年儿童队在西宁刚刚建立不久，团西宁市工委就举办了全市首届“寒假儿童学园”，参加这次学园的有来自省、市属各小学的少儿队员代表 100 余人。主要活动有学习团队知识、音乐舞蹈、小制作、讲故事、作时事报告、参观访问、看电影，因为是寒假，室外气温太低，所以学园的活动多在室内进行。参加首届寒假儿童学园的辅导员有团市工委的李文彬、李生信、吕光祖，还有市属学校的首任辅导员陈立甲、杨成琦、马颖、沈克文、邹学文、市教科副科长王彦，有时也来学园。这是一次少儿队的活动，也是少儿队在西宁市建立后的第一次少儿队辅导工作经验交流，我与省属小学的廿余名队员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1952 年暑假，团西北工委在陕西武功农学院举办了西北首届少年夏令营，我受团省工委的委派，带领我省 10 名少儿队员代表参加了这次夏令营。这 10 名队员代表是李钟林、年佩芝、马克武、尕周杰、马菊仙、赵玉瑛、李淑梅、李元芳、马泽民、李生华。年龄最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二、三岁，其中有藏族儿童 1 名，土族 1 名，回族 2 名；男队员 4 名，女队员 6 名。我们的队员，途经天水时，受到天水市少年儿童的热烈欢迎。在夏令营结束时，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亲切接见，当时火车只通到天水，又恰逢天宝段塌方，

我们去时只好绕道秦岭南面，翻过秦岭到达营地。回来时又取道平凉，从北路返回，往返近两千里，由于孩子们年龄小，一路上既有欢乐，也有惊吓，但对孩子们的教育却很深刻。现在这些孩子都已年近花甲，但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感趣味无穷，永世难忘，对此我拟另文详细叙述。

1953年暑假，团中央举办全国首届少年夏令营，我省派出1名队员关秀兰，参加了这次夏令营。同年青海省举办了全省首届少年夏令营，地点在西宁城西安西堡（原青海师范校址，现五四大街小学）来自西宁及外州县的近百名少儿队员参加了这次活动，其中来自乐都的队员逯敬康后任青海大学党委书记，青海教育学院院长。当时担任生物兴趣小组的辅导教师朱世奎同志，后任青海社会科学院院长，这次夏令营还组织队员赴大通露营、参观煤矿，登老爷山采集标本，给孩子们留下的印象也很深。团省工委赵喜民同志、李光祖同志都是这次夏令营的积极组织者，我当时担任夏令营总辅导员，在抗日战争中曾经是抗日儿童团团员，团省工委书记刘立彬同志，还为夏令营的队员们讲述了儿童团的故事，要求少儿队员们继承和发扬儿童团热爱祖国，反击侵略的优良传统。

各学校每学期都要举办一至二次大队活动。大队活动是在中队活动的基础上进行。我们要求大队活动一要准备充分，因为准备的过程，正是孩子们受教育的过程。二要仪式隆重，不能走过场，因为只有隆重而热烈的场面，才能震撼儿童的心灵，使之受到教育，当时对我印象最深的大队活动如青师二附小的“火车开向北京城”，他们把整个校园布置成一幅祖国的立体地图，火车从西宁出发（当时火车还不到西宁，只是让孩子们展开想象），经兰州渡过黄河，再经天水穿过山洞，经八百里秦川到郑州北上直至北京，一路上有山有水，有农田、树木、村庄和工厂；北有长城，南有长江。火车每到一站，便有解说员，介绍此地的山川地貌，人文景观，使孩子们形象而直观地学到了许多地理知识，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也培养了集体主义思想和动手能力。前些日子我曾碰到一位年过花甲，当时是该校队员的老同志，他还津津有味地向我叙述为了准备此次活动，他去农村采集松树枝、到河滩拣黑白小石子的情况，可见这次活动给学生留下的

印象之深。辅导这次活动的是当时该校的辅导员、地理老师吉生琨同志(已故)。省实验小学 1953 年举行的“六一游园”也是一次难忘的大队活动:队员们把整个儿童公园(当时称胜利公园)全都装扮起来了,树上挂满了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小红花,林荫道上挂起了彩旗,红领巾们手拉着手,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围着人工湖,跳起了集体舞,他们在湖面上荡起双桨,在草地上、花丛里玩着游戏,公园里到处是红领巾,到处是欢声和笑语。充分现示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的欢乐与幸福。此外还有许多活动,如“五一营火晚会”,“与志愿军归国代表联欢”,给省首届团代会献词(曾任城中区教育局局长的王一曼同志,当时就是这次献词的队员之一)等都是十分有教育意义,也是令人永远难忘的大队活动。

1953 年 8 月 21 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1954 年 6 月 1 日,团中央又公布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1957 年 5 月 15 至 25 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上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从此,“中国少年儿童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两个名称,便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甚至遗忘了。我记得 1992 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海教育大事记》在未出版之前,我曾看到该书的本稿,只翻了几页,就发现有几处错误,其中在 1950 年的大事中,把“少年儿童队”误记为“少年先锋队”,我当即向编者提出修改意见。但是该书出版后,竟然将少儿队的建立从青海教育大事中删去,相反的对于那些工作平平、在青海教育发展中并未发挥多大作用的某些科处级干部的任免名单,却罗列了一大堆。该书在第 24 页只提到:1953 年 7 月 28 日“青年团青海省工委在西宁西郊安西堡举办省首届夏令营”一句,夏令营的名称不完整,不知道是为谁办的夏令营。我以为既然名为“大事记”,小事可以不记或少记,但大事记错不对,不记则更不对。《青海省志·教育志》中对少年儿童队的建立及初期活动有记载(见该书 54 至 55 页),但限于篇幅,记叙比较简略,我写此史料,目的只是为了“存史”,只是对正史的一点补充,仅此而已。

1998 年 6 月 1 日

缅怀杨成琦同志

张维珊

杨成琦，字元璞，男，汉族，青海省西宁市人，生于民国一十八年（公元 1929 年），卒于 1995 年，享年 66 岁。他是我的老同学和战友。

杨成琦同志是西宁手工业名家“杨粉坊”杨生禄的三子。家住观门街东口。幼年就读于西宁锐威小学（现西宁一中），后入西宁中学（现西宁五中），他白天上学读书，早晚帮助家人加工粉条和豆腐。自幼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优良品德，他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优秀；为人忠诚老实，乐于助人，深受同学们的好评。

1949 年 9 月 5 日西宁解放。杨成琦于 1952 年参加革命工作。195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成琦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后，相继在西宁市职工业余学校任教师；东关大街小学任副校长；西宁市委宣传部任干事、副科长。

1956 年至 1957 年间，他先后到青海省委党校和中央高级党校进修，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亲自聆听了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讲座。

1966 年，杨成琦同志负责筹建中共西宁市委党校，任副校长。

1966 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杨成琦同志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蒙受了不白之冤，心灵上受到创伤，身体上受到摧残，导致双手颤抖，严重时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别人喂饭吃，同时也埋下了癌症的隐患。

1968 年，市委党校停办，杨成琦同志去市五·七干校学习锻炼。

1968 年至 1977 年间，他先后任西宁市秦剧团团长，中共乐都县委副书记等职。

1978年中共西宁市委党校恢复，杨成琦同志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

杨成琦同志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的理论教育事业矢志不渝。就是用这颤抖的双手，起草和修改党校的教育计划，工作安排和工作总结；就是用这颤抖的双手，摘抄资料，准备教案，撰写论文；也就是用这颤抖的双手，参加各项公益活动和集体劳动，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和思想作风。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市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广大职工，大都听到过杨成琦同志关于马列主义理论和毛主席著作的辅导讲座。笔者也听过他对毛泽东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辅导讲座，受益匪浅，甚为钦佩。许多在市委党校学习过的同志，都被杨成琦同志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所感染。杨成琦同志在培养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宣传骨干的事业中，他既有苦劳，也有功劳。

1985年，杨成琦同志在市委党校退休。退休后，曾连续担任市委党校离退休职工党支部书记和有关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他还与都蔚章联络在西宁离退休的老同学冯辉、张基忠、张守业、刘秉仁、耿英、瓦琛、张维珊、李汝鑫、梅锦春、朱世奎、李希玄、刘沛、苏生森等十多人组成学友会，杨成琦任会长。还邀请郑行健先生参加了学友会，学友会决定每两个月轮流在同学家聚会一次，聚会时，大家在一起叙旧说新，谈古论今，赏花咏诗，无比欢乐，情意悠悠，共度晚秋。笔者曾咏《学友颂》一首：

年少同学老时友，
养怡求福度晚秋。
共叙友情常聚会，
赏花咏诗乐悠悠。

1991年，杨成琦发现身患贲门癌，经医院手术治疗，略有好转，但杨成琦不把癌症放在心上，他心胸开阔，乐观豁达，并决心与病魔做斗争，战而胜之。他一边坚持药物治疗，一边加强营养和锻炼，并坚持为青海师范大学师生辅导气功，边教边练，坚持了3年多，深受

该校师生的好评。病危时，他为了尽量不让国家为自己花销更多的医疗费用，不愿再住进医院。他在临终之前，一再嘱咐家人要丧事简办，坚持俭朴为本。

杨成琦同志平时教育子女严于律己，克勤克俭，在工作上要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杨成琦同志于1995年4月10日2时50分在家病故。

笔者与都蔚章同志主持了杨成琦同志的葬礼。老同学老战友陈立甲为杨成琦撰写在房门上的对联是：

学富五车播真理
辛劳一世范后人

灵桌前的挽联是：

是河湟子做天下事
秉公仆烛怀风雨情

丧事期间市委副书记刘基林到家中悼念。

杨成琦同志病故后，中共市委在市委《西宁晚报》上发了讣告。市委党校于4月13日在毛胜寺殡仪馆为杨成琦同志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市委党校领导和职工，杨成琦同志的生前友好和亲友及子女约二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学友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

市委党校为杨成琦同志追悼大会撰写的挽联是：

身献论坛哀哀留忠骨
如松如柏 胸怀祖国赫赫扬英名

市委党校第二任校长藩雄致了悼词；

朱世奎同志代表老同志读了悼文；

向杨成琦同志遗体告别后，遗体火化，骨灰盒葬于大西山祖坟。

记老教育家徐景祥

侯万奎

徐景祥老校长是一位值得尊敬和回忆的教育界老前辈，他出生于河南省登封县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三八年曾在河南上中学。后因时局需要考入河南省主席商震所办的河南省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一心投笔从戎，抗击日寇，报效祖国。后因家庭种种原因中途停学，被聘请到河南省登封县，告城区完小任教导主任及代校长，后因原任校长调走，上级任命为校长。一九四二年任河南省登封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教员兼教务主任。一九四三年考入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一九四五年，西北师院教育系本科毕业。同年八月任甘肃省科学教育馆辅导员；一九四六年八月任国立兰州大学附中教员、训导主任；一九四八年八月来青海任国立西宁师范学校教育学课教员。在校期间，深入调查研究青海教育的实际状况。结合实际进行教学。在教学中，条理清楚，内容丰富，概括能力强，记忆要点明确，使学生记一次即可经久不忘，深得学生欢迎。

解放前夕，已可明显看出一部分学生追求进步，阅读进步书刊，做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他便设法掩护，给予指点。让学生注意免遭当局打击。对一些极右学生也给予适当训导。

部分进步教师一旦遇难，他便大力相助，当时国立西宁师范的两位老师，杨东皋和王丹书因购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等进步书籍被抓进监狱。徐老师为他们送饭、送衣。这种做法，当时是要受到反动政府的严格监视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青海西宁解放，学校一片混乱，有的学生受部分特务老师的蒙骗，阻碍学校受省军管会派来的军事代表的管理。但徐老拥护军管会派人进驻学校管理学校，坚决站在进步学生一边，抵制“护校会”活动，协助军代表，介绍学校师生情况，并积极提

供良好建议,使学校秩序很快好转。后经广大师生的提议和军事代表王时智的考核,提任为学校教育主任。一九五零年二月,经省人民政府决定:任命为合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国立西宁师范学校与青海省立西宁师范学校合并,成立青海师范学校)。之后,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中师班也奉命合并在该校。

一九五〇年三月至五八年二月,先后任青海师范,西宁师范代校长、校长。

在这一阶段,徐老曾把全部精力与热情,学识与才智献给了青海教育事业。他迫切的希望青海教育事业尽快发展与兴旺,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得党组织的信任和广大师生的拥护和尊敬。在他任校长时期可谓青海师范的辉煌时期。当时的青海师范,教师团结一致,学生努力学习,教学质量名列全省前茅,校园整洁,校风文明,学校威望蒸蒸日上。

徐老还具有一种令人难忘的平易近人与民主作风,他常常深入群众,到教师家中登门拜访、或请教师到家作客,教师要想说的话,想要提的建议,情绪上的不平衡都能对他交心。使领导与教师中间沟通思想,使教师感到领导亲切关心、个人工作舒心。对于学生更是谆谆教导、循循善诱,学生犯了错误,总是在关心和指出错误后,让学生口服心服地改正。每周六他总是到学生宿舍查看卫生情况和学生的文体活动。在时隔三、四十年之后,如果学生站在徐老面前,他仍能一个个叫出名字,说出每个学生的特点爱好,这一点可以说明师生之间深厚的感情。

当时的青海师范形成了一个民主、活泼、求实,奋发向上的好校风,社会活动也在省上名列前茅。如组织过两百人的大型秧歌队,话剧演出小组、街头宣传队,都是自编自演。学生还组织过宣传工作组,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抗美援朝以及反细菌战的卫生宣传活动,并进行了扫除文盲而兴办农村夜校等。

五〇年底、五一年初党为培养少数民族教师,先后从玉树等地区招来藏族学生,当时青海民族学院尚未建立,于是青海师范又增加了新的任务。时常有外地、及省内各民族代表团来校参观,就这一项活

动学校领导曾费了很多时间和专人去应酬。就在这批少数民族学生中，日后担任我省省级、厅局级职务的就有十多人。

徐景祥校长胸怀坦荡，公私分明，他的办公室十分简陋，一张旧办公桌，一把破旧坐椅，一把扫帚，几张办公便笺，简单的很。外出开会骑一辆普通自行车。他反对铺张浪费，自己身体力行，勤俭办学。所以在他任职期内学校没有贪污之事。学生也没有损坏公物之类的事情发生。他自己也没有接受过一份别人的厚礼。

一九五五年，徐老在中国民主同盟青海省委宣传部工作（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和民盟省委常委），当年徐老代表青海民盟到北京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徐老一行受到毛主席、周恩来、彭真、李维汉、汪锋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聆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周总理的讲话。

会议期间，徐老还参加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出席这次宴会的还有中央领导习仲勋、甘肃省长邓宝珊、民盟中央领导沈钧儒，及民盟其他同志。

这一次北京之行，使他终生难忘，从此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他回校后更加靠拢党组织，学校工作更上一层楼。

一九五七年，一场政治风暴吹进了青海师范学校，极左路线的代理者扩大了打击面，竟将一位十分忠诚的教育工作者，妄加了种种莫须有之罪名，残酷迫害。

在这种形势下，徐老仍抱着拯救部分教师、宁肯让别人把“罪责”加在自己头上，不愿牵扯别人。凡是学校发生的事都说与他有关，其实是某些人故意捕风捉影，加害别人。

青海师范后来执行过极左路线，使大批知识份子受到摧残，民主和谐的校风被践踏。学校的名气也消失了，老一代学生们回忆这段经历还很沉痛。

一九五八年五月至一九六八年十月徐老任民盟青海省委干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零年七月先后在省五七干校劳动、在该校担任附中（五七中学）教员，及教导主任。在五七干校时仍如以前，认真负责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一九八零年八月，任青海教师进修学院（教育学院的前身）图书馆负责人，八五年五月退休。

退休后由于青海民盟恢复正常工作，民盟省委又调徐老任秘书长职务。在此期间，人虽退休，但志不退休，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两鬓染霜，仍坚持上班。忠于党的统战事业，在各种场合总强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中国站立不起来；没有邓小平，中国人富不起来。”这些心情是徐老一贯的看法，是他忠诚的所在。

一九九七年元月四日是徐老八十寿辰，住在西宁地区的八十多位老学生，二十多位老教师，自愿为老人祝寿，学生们以诗、书、画、歌、舞、摄影、电视录像等方式为老人祝贺生日，场面隆重而热烈，这在青海教育界还是第一次。

——缅怀终生致力于西宁新学教育的王锡九先生

王学德

王万龄先生，字锡九，从三十年代起至解放，一直从事教育。现根据个人记忆及锡九先生在西宁解放后回故乡镇海堡（现称通海）老家住闲时，向当地政府所写的自己履历表的底稿，对他的生平简介如下：

从这份履历表中可以看到：锡九先生于民国三年（1914年）在甘肃省立师范学堂（在兰州）毕业，民国四年（1915年）即由甘肃省教育厅委派王栋（字云甫，互助县红崖子沟人）、汪发祥（字子俊，湟中县海子沟人）和锡九等人筹办西宁县立兴文两级小学校（七年制教育）的工作。

西宁县立兴文两级小学校是在兴文社学的基础上筹建的，民国三年（1914年）由原址董公祠迁移县儒学旧址（今西宁市十四中学校）。到民国九年（1920年）该校奉命改为西宁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锡九先生担任了第三任校长。

锡九先生自民国五年（1916年）他廿五岁开始从事西宁的小学教育到民国卅一年（1942年）他五十二岁止，其间共廿六年时间，这一段是他一生中风华正茂的年纪。他除担任校内的文理各科的教师外，主要而更艰辛的工作是以校长名义深入西宁社会各阶层，进行宣传动员开展新学教育。他不辞艰辛，奔走呼吁，努力劝募捐资，申请县府，扩宽校址，苦筹基金，维修新建教室校舍，添置桌凳教具，增设操场，购置体育、音乐、美术、劳作的教学设备器材。几年之间，校田、校产、基金不断增加，田产商铺收租，基金贷商生息，在他和教师们和衷共济，苦心经营之下，办学经费日渐宽裕。新学制的教师，应聘到该校任教者十多人，教学水平不断提高，西宁城乡人民有口皆碑，把